“生育主力”缘何有名无实？

——基于743份城市青年生育意愿的问卷调查分析

周国红 何雨璐 杨均中[1]

【摘 要】：城市青年作为生育的主要承担者，其生育意愿的强弱直接影响到一个国家人口总和生育率的高低。在计划行为理论和生育意愿相关理论基础上，利用浙江省宁波市743份有效调查问卷数据，建立城市青年生育意愿影响因素结构方程模型，揭示城市青年生育意愿高低的影响因素。结果显示，行为态度对生育意愿起决定性作用，感知行为控制对生育意愿也有极显著的正向影响。物质支持对行为态度起决定性的正向影响作用，但对感知行为控制具有极显著的负向影响。社会网路支持正向显著影响感知行为控制，但负向显著影响行为态度。

【关键词】：生育意愿 城市青年 影响因素 结构方程模型

一、引言

“全面二孩”政策实施以来，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2016年全年出生人口总数为1786万，比2015年全年出生人口增加171万。然而，随后的几年，全国出生人口总量逐年下降，分别为2017年的1723万、2018年的1523万和2019年的1465万。中国公安部户政管理研究中心发布的《2020年全国姓名报告》显示，2020年出生并已经到公安机关进行户籍登记的新生儿共1003.5万，同比2019年减少175.5万[1]。可以预见，2020年的人口出生率将低于2019年的10.48‰，再创1949年以来新低。

从人口总和生育率看，国家统计局资料显示（图一所示），我国 1950-2018 年总和生育率下滑明显，当前不仅远低于 2.45 的全球平均水平，还低于1.67的发达国家水平[2]。根据联合国统计，1950-2015年美国总和生育率从3.3降至1.9，日本从3降至1.4，印度从5.9降至2.4，均远小于中国的总和生育率从6到1.6的降幅。

2018年中国总和生育率为1.52，在全球位居倒数，不仅远低于2.45的全球平均水平，还低于1.67的高收入经济体水平。与墨西哥、巴西、马来西亚、俄罗斯等人均 GDP 相近的国家相比，中国总和生育率仍然偏低。从世界银行数据材料看，在出生性别比例正常情况下，国际上普遍认为生育更替水平为2.05—2.1，也即一个国家的总和生育率在2.05—2.1个孩子时，能够实现上一代人和下一代人的更替平衡，但目前我国现在的人口总和生育率不断下滑，而且低于发达国家水平，说明我国的“单独二孩”和“全面二孩”政策均未能扭转低迷的生育趋势，“生育堆积”效应已然消退。

[1]**作者简介**：周国红，博士，浙大宁波理工学院教授；何雨璐、杨均中，浙大宁波理工学院学生。（宁波 315100）
基金项目：国家级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二孩政策为何遇冷？——城市青年生育意愿的现状及其影响因素的调查分析”成果

图一 1950-2018 年中国人口总和生育率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恒大研究院。

人口总和生育率是衡量一国新生儿数量的重要指标，它的高低直接影响到一个国家未来几年甚至几十年的人口总量，进而影响到这个国家的人口战略与方针政策。城市青年作为生育的主要承担者，其生育意愿的强弱直接影响到一个国家人口总和生育率的高低。国内相关学者对城市青年生育意愿现状的研究发现，处于不同城市、具有不同文化程度、不同婚姻状况的城市青年的生育意愿基本相同。

从数量上看，三分之一左右的青年希望生育两个孩子，60%左右的青年希望生育一个孩子，5%左右的青年不打算生孩子，希望生育三个以上的不足 1%（风笑天，2004）。我们本次研究调查了 743 名城市青年，其生育意愿也和已有研究相类似。很显然，城市青年作为“生育主力”只不过是理想中的称谓。为探究城市青年生育意愿的影响因素，本文以城市青年为调查对象，在计划行为理论、生育率经济理论、社会支持理论和工作-家庭冲突等理论基础上，提出包括 9 个潜变量的城市青年生育意愿影响因素理论模型，根据问卷调查的数据，利用 AMOS 软件构建城市青年生育意愿影响因素的结构方程模型，从定量上揭示城市青年生育意愿高低的影响因素。

二、文献回顾与模型假设

不同生育政策背景下的生育意愿及其影响因素的问题在理论和学术界已经进行了较多的探索和研究，并取得了一系列的成果。以“生育意愿”作为篇名检索条件对中国知网期刊数据库进行搜索，截止 2021 年 2 月共有相关论文 1237 篇，其中 2021 年 20 篇，2007 年之前每年发表的论文基本都在 10 篇左右。

从被引次数和影响力来看，有代表性的研究主要有：风笑天等（2002）、侯佳伟等（2014）、张原等（2015）利用相关历史调查数据，研究了我国居民近几十年来生育意愿及其变迁情况；顾宝昌等（2011）、郑真真（2014）、张霞等（2018）梳理了生育意愿、生育行为等相关概念理论及其相互关系，以及生育意愿的测量等关键性理论问题；陈彩霞等（2003）、茅倬彦（2009）则利用相关调查数据，实证研究了生育意愿与生育行为之间的差异；尤丹珍等（2002）、郑真真（2004）、陈卫等（2011）利用相关调查数据，实证研究了中国妇女生育意愿状况，以及生育意愿的个体、区域差异性；风笑天（2004）、尹勤（2006）、宋健（2010）等则利用相关调查数据，对不同城市、文化程度、婚姻状况的城市青年的生育意愿进行了研究，结果显示当代城市青年的生育意愿渐趋一致。

我国于 2013 年正式实施了单独二孩政策，国内学者对居民的生育意愿展开了更多的研究[石智雷等（2014）；杨菊华（2015）；贾志科等（2015)];2016 年，我国实施全面二孩的人口生育政策，有关生育意愿的研究已日趋成为一个热点与焦点问题[张永梅（2018）；潘新新等（2016）；田立法等（2016）；梁宏（2018）]。

在生育意愿影响因素方面，纵观研究我国居民生育意愿的现有文献，多集中在个人状况[周福林（2005）；莫玮俏（2019）]，如收入、年龄、健康、婚姻；家庭状况[何明帅（2017）；周晓蒙（2018）；魏瑾瑞等（2019）]，如家庭经济条件、教育程度、外部稳定性；物质经济状况[王天宇等（2015）；汤兆云（2012）；王志章等（2017）]，如经济水平、社会保障以及房价等方面；文化观念[何兴邦（2017）；周俊山等（2009）]，如传统的“养儿防老”、生育文化等方面。

这些研究都是从人口与家庭特征、物质经济条件以及生育文化与观念等方面来揭示生育意愿影响因素的，而从社会心理学和生育意愿相关理论角度阐述生育意愿影响因素的则还不多见。社会心理学中的计划行为理论自提出以来，已广泛应用于各行业领域，例如健康保健、休闲活动、旅游出行、环保行为、就业选择、购物消费、在线活动和在线服务使用等，模型中行为态度、感知行为控制和主观规范三个变量对行为意愿的预测和解释能力从多项研究中得到了实证。为构建理论模型，本文还借鉴了生育率经济理论、社会支持理论和工作-家庭冲突等与生育意愿相关的理论。汇总概述了社会心理学中的计划行为理论，以及生育率经济理论、社会支持理论和工作-家庭冲突理论等相关核心观念。

本文以社会心理学中的计划行为理论为基础，结合城市青年生育意愿的特点，选取行为态度和感知行为控制作为生育意愿的直接影响因素。同时，融合生育率经济理论、社会支持理论和工作-家庭冲突等相关理论，将物质支持、社会网络支持、政策支持、感知风险、情感体验和感知价值等六个方面作为外部变量，最终构建了城市青年生育意愿影响因素理论模型，具体见图二。

依据研究模型中的设定变量和路径关系，本调研提出的研究假设包括：各影响因素变量与感知行为控制、行为态度之间的关系假设；感知行为控制与生育意愿之间的关系假设；行为态度与生育意愿间的关系假设。

H1：物质支持（wz）对生育的行为态度（td）有显著影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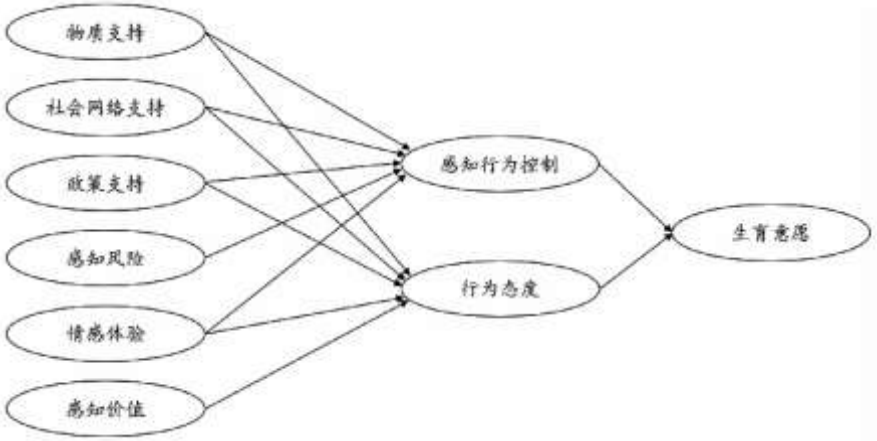
H2：社会网络支持（sh）对生育的行为态度（td）有显著影响；

H3：政策支持（zc）对生育的行为态度（td）有显著影响；

H4：情感体验（qg）对生育的行为态度（td）有显著影响；

H5：感知价值（jz）对生育的行为态度（td）有显著影响；

H6：物质支持（wz）对生育的感知行为控制（xk）有显著影响；



图二生育意愿影响因素理论模型

H7：社会网络支持（sh）对生育的感知行为控制（xk）有显著影响；

H8：政策支持（zc）对生育的感知行为控制（xk）有显著影响；

H9：感知风险（fx）对生育的感知行为控制（xk）有显著影响；

H10：情感体验（qg）对生育的感知行为控制（xk）有显著影响；

H11：行为态度（td）对生育意愿（yy）有显著影响；

H12：感知行为控制（xk）对生育意愿（yy）有显著影响。

三、实证检验

（一）数据来源及样本信息特征

青年的定义随着政治经济和社会文化环境的变化而有所不同。截止目前，中国国务院没有专门对青年的年龄作出行政界定，但世界卫生组织（2017 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中国国家统计局、中国共青团等机构与组织都对青年的年龄进行了界定。本文根据世界卫生组织 2017 年确定的年龄分段，将我们调查的对象——城市青年年龄定为 18 至 44 周岁之间的人，包括户籍人口和流入到城市的非户籍人口。

2019 年 7-9 月，我们对浙江省宁波市 5 区 39 个街道的城市青年进行问卷调查，调查方法采取分层抽样和简单随机抽样相结合的办法，共发放问卷 900 份，最后回收有效问卷 743 份。对收集起来的 743 份有效问卷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可以得到样本信息特征。从调查样本的性别分布状况看，女性人数占 54.4%，男性占 45.6%；从年龄分布来看，受访者中 41-44 岁的城市青年所占比例最少，26-30 岁这一年龄区间的受访者所占比例最大，18-25 岁、31-35 岁、36-44 岁这三个年龄段占比较多，分别占总体的 21.8%、23.8%、14.7%；从婚姻状况分布来看，受访者中已婚和未婚的比例接近 2:1，以已婚人群为主；在受教育程度方面，本科学历的人数最多占 32.3%，初中以下和硕士以上较少，高中、中职及中专占 28.3%，大专比较接近在 24.5%左右；在是否是独生子女方面，非独生子女受访者所占比例稍多，占比为 53.8%；在税前个人月收入方面，受访者中有近一半的受访者税后月收入在 4500 元及以上；在工作单位类型方面，就职单位最多的是民营企业，所占比例 23.4%，其他职业人群所占比例最少，

为 6.1%，仅次于外资企业比例 8.9%，其他职业分布较为均衡；从原生家庭规模情况来看，三口之家最为普遍，占比 44.7%，家庭规模 2 位及以下的、4 位与 5 位的占比较为均衡。总体来说，该样本与现实情况较为相符，具有较强的代表性与客观性。

另一方面，本文为了揭示城市青年生育意愿高低的影响因素，借鉴相关成熟量表，采用李克特 5 级量表，设计出与模型 9 个潜变量相对应的、通俗易懂的观测题项。为保证观测题项的科学性与适用性，在正式调研之前，进行了两次预调研，第一次调查了 60 位城市青年，第二次调查了 70 位。根据两次预调研和受访者反馈意见，通过信度与效度分析对量表题项进行严格筛选与剔除，对量表中涉及的题目数量及语言表述进行测试、调整与修改，最终确定 36 个量表题项。

（二）信度与效度检验

为确保调研问卷的可靠性和有效性，首先采用统计产品与服务解决方案（SPSS22.0）软件，由内部一致性信度（克朗巴哈系数）对物质支持、社会网络支持、政策支持、感知风险、情感体验、感知价值、感知行为控制、行为态度以及生育意愿等 9 个潜变量的可观测变量进行信度分析。这 9 个潜变量的信度较高。其次，通过平均差异萃取量和标准化因子载荷来检验聚合效度，所有观测变量的标准化载荷取值在 0.564-1 之间（见图三）[3],t 检验值也均在 0.05 水平上显著，说明结构模型效度也较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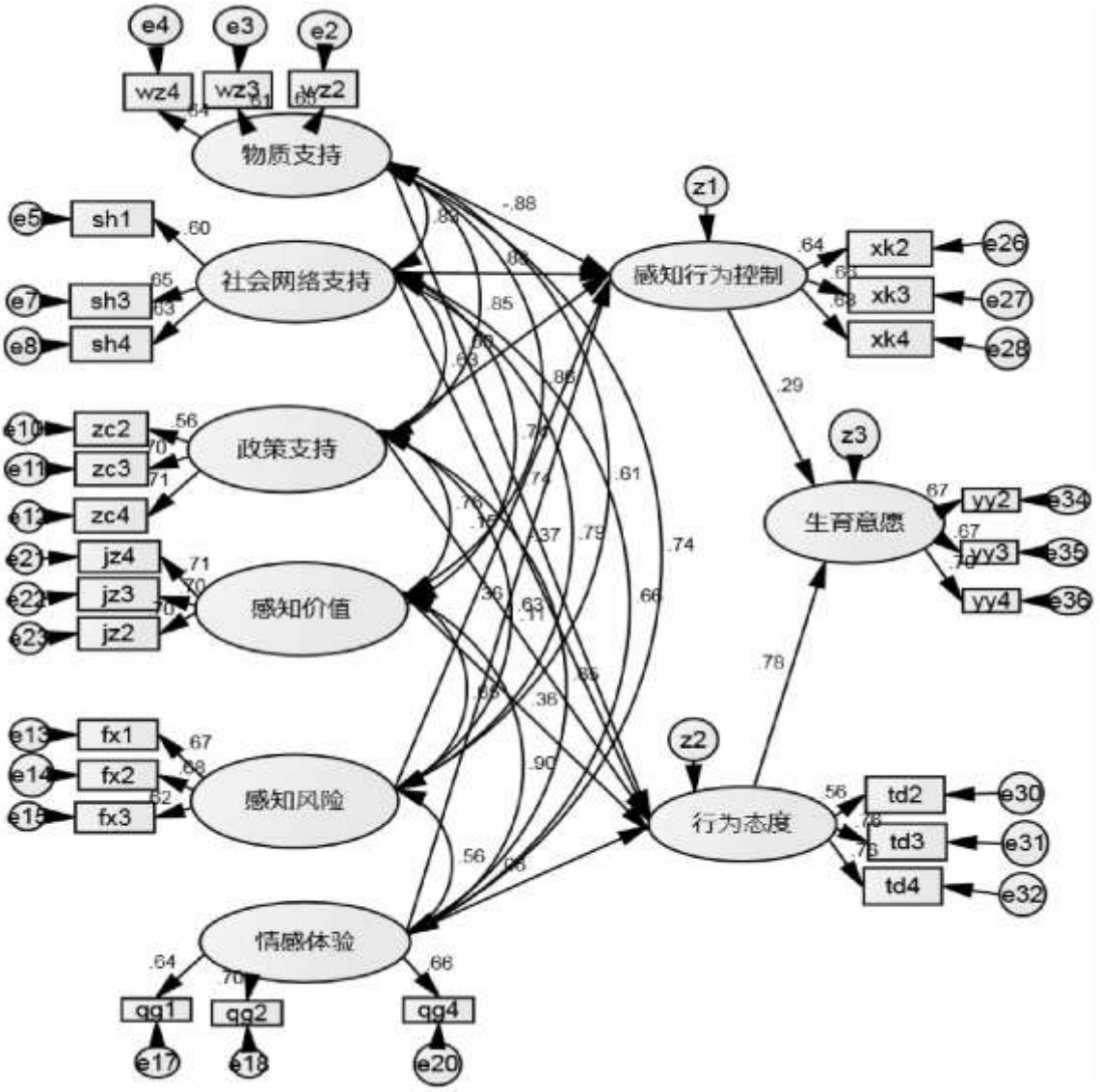
（三）结构方程模型检验

本次建模采用 AMOS21.0 软件，按照本文提出的理论模型，对物质支持、社会网络支持、政策支持、感知风险、情感体验、感知价值、感知行为控制、行为态度以及生育意愿等 9 个潜变量，以及对应的 36 个观察变量设置好因果关系路径图后，运行程序得到初始拟合模型。

可知，在绝对拟合指数中，卡方值与自由度之比（x^2/df）为 4.292，这一指标值偏大，效果不甚理想。这主要是由本研究的卡方值较大（2433.427）引起的，而卡方值比较大的根源可能在于本研究的样本容量比较大（743 份有效问卷）。吴明隆（2009）认为，结构方程模型适配度的卡方检验最适用的样本数为 100 至 200，当样本数较大时，往往造成卡方值偏大。

邱皓政等（2009）也认为，结构方程模型拟合所用的样本量越大，其卡方值也越大，因而结构方程模型的适配度检验除了卡方统计量外还需同时参考其他指标。在本模型中，RMSEA 值为 0.067，小于 0.08,RMR 接近 0.05，说明模型不错，但 GFI 略偏小；在相对拟合指数中，CFI、IFI 和 TLI 的值都大于 0.8，但 NFI 略偏小，说明这几个指标基本满足模型检验与拟合优度的要求。

为了得到更理想的模型，我们结合相关理论以及实际情况，从模型参数的显著性检验 P 值，以及模型的修正指数，删减了物质支持→wz1、政策支持→zc1、社会网络支持→sh2、感知价值→jz1、情感体验→qg3、感知风险→fx4、行为态度→td1、生育意愿→yy1 等变量间的相关路径；利用临界比率（Critical Ratio）结果，对没有显著差异的相应参数估计设定为相等的方法来修正模型，最终得到如图三的修正模型。



图三修正后城市青年生育意愿影响因素结构方程模型图

检验结果显示，修正后模型的整体拟合度有较大幅度提升。在绝对拟合指数中，模型的卡方值与自由度之比（ x^2/df ）为 2.985，在可接受范围内。在实际研究中，普遍认为 x^2/df 应当小于 3，值越小，表示模型拟合度越高。当样本容量较大时，5 左右也可接受。

由于我们的样本容量较大，因此，在统计上接受模型是没有问题的；RMSEA 值 0.052，小于 0.08,RMR 值 0.040，小于 0.05,GFI 值 0.906，大于 0.9，说明模型不错；在相对拟合指数中，CFI、IFI 和 TLI 的值都大于 0.9,NFI 值 0.882，略偏小，但也在可接受范围内，说明模型的拟合度较好，修正模型的拟合效果更优。

（四）路径分析与模型结果讨论

由标准路径系数可知，行为态度对生育意愿影响很大，其标准路径系数为 0.777，表示行为态度提高一个百分点将直接使生

育意愿提高 0.777 个百分点。在影响行为态度的潜变量中，物质支持对行为态度的影响最大，其标准路径系数为 0.743，表示物质支持提高一个百分点将直接使行为态度提高 0.743 个百分点；其次是社会网络支持，它对行为态度有极显著的负向影响，其标准路径系数为-0.372，表示社会网络支持提高一个百分点，行为态度反而下降 0.372 个百分点；再次是感知价值，它对行为态度有极显著的正向影响，其标准路径系数为 0.360，表示感知价值提高一个百分点将直接使行为态度提高 0.360 个百分点；不过，政策支持与情感体验对行为态度的影响在统计上是不显著的。

感知行为控制对生育意愿也有极显著的影响，其标准路径系数为 0.289，表示感知行为控制提高一个百分点将直接使生育意愿提高 0.289 个百分点。在影响感知行为控制的潜变量中，社会网络支持对感知行为控制的影响是最大的，其标准路径系数为 0.880，表示社会网络支持提高一个百分点将直接使感知行为控制提高 0.880 个百分点。

物质支持对感知行为控制影响的标准路径系数为-0.880，表示物质支持对感知行为控制具有极显著的负向影响；其次是政策支持，它对感知行为控制也有极显著影响，其标准路径系数为 0.501，表示政策支持提高一个百分点将直接使感知行为控制提高 0.501 个百分点；再次是情感体验与感知风险，它们对感知行为控制也有极显著影响，其标准路径系数分别为 0.362 和 0.150。

可知，我们提出的研究假设，部分得到了验证，部分假设没有通过检验。根据我们的模型设置以及模型检验结果可以得到，行为态度对城市青年生育意愿起着决定性的作用，感知行为控制对生育意愿也有极显著的正向影响。对行为态度的影响因素来说，按照影响的大小，依次是物质支持、社会网络支持与感知价值，而政策支持与情感体验对行为态度的影响在统计上是不显著的。对感知行为控制的影响因素来说，按照影响的大小，依次是物质支持、社会网络支持、政策支持、情感体验与感知风险。

四、结论与启示

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人口问题也一直是我国社会的焦点之一。在过去几十年里，中国经历了前所未有的人口变化。从上世纪 80 年代独生子女政策的施行到 2016 年全面开放二胎政策，如此重大的转折，预示着中国从改革开放以来就在积极地调整着人口结构，以谋求更快、更好的发展。虽然人口问题广受人们重视，但是以往研究大都是从人口与家庭特征、物质经济条件以及生育文化与观念等方面来揭示生育意愿影响因素的，而从社会心理学和生育意愿相关理论角度阐述城市青年生育意愿影响因素的还很少。

本文尝试构建了由 9 个潜变量、36 个观察变量构成的城市青年生育意愿影响因素的结构方程模型，研究发现：

（1）行为态度对城市青年生育意愿起着决定性的作用，感知行为控制对生育意愿也有极显著的正向影响。在影响生育意愿的两个主要变量中，行为态度和感知行为控制都对生育意愿有极显著的正向影响，但行为态度的影响作用明显大于感知行为控制。对行为态度的影响因素来说，按照影响作用的大小，依次是物质支持、社会网络支持与感知价值，而政策支持与情感体验对行为态度的影响在统计上是不显著的。对感知行为控制的影响因素来说，按照影响的大小，依次是物质支持、社会网络支持、政策支持、情感体验与感知风险。

（2）物质支持对行为态度起着决定性的正向影响作用，但对感知行为控制却具有极显著的负向影响。物质支持的三个观察题项分别为：“我认为我的收入能够养育孩子”、“我认为产后恢复服务可以满足我的需要”、“我认为国内医疗水平可以满足我的生育需要”，这说明，收入与医养水平是影响城市青年生育意愿最为重要的因素。而且，从物质支持与感知行为控制是负向关系可以得到，物质支持越强，感知行为控制越弱，也即物质支持越有保障，年龄、受教育程度、婚姻等状况对生育意愿的影响越弱。

（3）社会网路支持正向显著影响感知行为控制，但却负向显著影响行为态度。对行为态度和感知行为控制的影响仅次于物质支持的是社会网络支持，虽然它正向显著影响感知行为控制，但是并没有如我们所预想的那样也正向影响行为态度，也即家

庭成员、亲朋好友等的“支持”，反倒成为城市青年生育意愿的“劝阻”，这个结论似乎有悖常理。一种可能的解释是：作为出生在中国社会急剧变革时期中的青年，是一代具有某种共同特征的特殊人群，他们的生育意愿渐趋一致，都具有某种共同的生育意愿（风笑天，2004）。

这种共同生育意愿，可能暗示外界物质或者亲朋好友的支持仅仅是生育的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另一方面，由于当代城市青年的自主性强，传宗接代、多子多福、养儿防老等传统生育观念已经较为淡薄。我们的本次调查发现，有近七成的受访城市青年生育二孩的动机是为了让原来生育的第一个孩子可以有陪伴，不孤单。这样一种二孩生育观念似乎说明，家人、亲朋好友的支持恰恰起到了一孩的陪伴、让其不孤单的作用，并不会因为家人和朋友的支持而提升他们生育意愿的行为态度。

参考文献：

[1].风笑天、张青松：《20 年城乡居民生育意愿变迁研究》，《市场与人口分析》2002 年第 5 期。

[2].侯佳伟、黄四林、辛自强：《中国人口生育意愿变迁》，《中国社会科学》2014 年第 4 期。

[3].张原、陈建奇：《变迁中的生育意愿及其政策启示——中国家庭生育意愿决定因素实证研究（1991-2011）》，《贵州财经大学学报》2015 第 3 期。

[4].顾宝昌、郑真真、马小红、杨菊华、周云：《生育意愿、生育行为和生育水平》，《人口研究》2011 年第 2 期。

[5].郑真真：《生育意愿的测量与应用》，《中国人口科学》2014 年第 6 期。

[6].张霞、夏巧娟：《生育意愿与生育率研究进展》，《经济学动态》2018 年第 12 期。

[7].陈彩霞、张纯元：《当代农村女性生育行为和生育意愿的实证研究》，《人口与经济》2003 年第 5 期。

[8].茅倬彦：《生育意愿与生育行为差异的实证分析》，《人口与经济》2009 第 2 期。

[9].尤丹珍、郑真真：《农村外出妇女的生育意愿分析-安徽、四川的实证研究》，《社会学研究》2002 第 6 期。

[10].郑真真：《中国育龄妇女的生育意愿研究》，《中国人口科学》2004 第 5 期。

[11].陈卫、靳永爱：《中国妇女生育意愿与生育行为的差异及其影响因素》，《人口学刊》2011 第 2 期。

[12].风笑天：《城市青年的生育意愿：现状与比较分析》，《江苏社会科学》2004 第 4 期。

[13].尹勤、温勇：《常州市育龄人群生育意愿及影响因素》，《南京人口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6 年第 2 期。

[14].宋健、陈芳：《城市青年生育意愿与行为的背离及其影响因素——来自 4 个城市的调查》，《中国人口科学》2010 第 5 期。

[15].石智雷、杨云彦：《符合“单独二孩”政策家庭的生育意愿与生育行为》，《人口研究》2014 第 5 期。

[16].杨菊华：《单独二孩政策下流动人口的生育意愿试析》，《中国人口科学》2015 年第 1 期。

[17].贾志科、风笑天：《城市“单独夫妇”的二胎生育意愿——基于南京、保定五类行业 558 名青年的调查分析》，《人口学刊》2015 年第 3 期。

[18].张永梅：《职业女性的两孩生育意愿及其政策启示——基于“知识女性”与“其他女性”比较的视角》，《浙江社会科学》2018 第 12 期。

[19].潘新新、赫林、汪斌：《全面二孩政策下“80 后”青年生育意愿及影响因素分析——基于浙江省 SX 市的实证调查》，《中共杭州市委党校学报》2016 第 2 期。

[20].田立法、荣唐华、张馨月、孙倩、张佳城、张海端、高建伟：《“全面二孩”政策下农村居民二胎生育意愿影响因素研究——以天津为例》，《人口与发展》2017 第 4 期。

[21].梁宏：《从生育意愿到生育行为：“全面两孩”政策背景下二孩生育决策的影响因素分析》，《南方人口》2018 第 2 期。

[22].周福林：《我国城乡居民分年龄、性别和受教育程度的生育意愿研究》，《西北人口》2005 第 4 期。

[23].莫玮俏：《婚姻稳定性与生育率变动关系的理论与实证分析》，《浙江社会科学》2019 第 5 期。

[24].何明帅、于淼：《家庭人均收入、代际社会流动与生育意愿》，《劳动经济研究》2017 第 5 期。

[25].周晓蒙：《经济状况、教育水平对城镇家庭生育意愿的影响》，《人口与经济》2018 年第 5 期。

[26].魏瑾瑞、赵汉林：《地区代际流动对居民生育意愿的影响》，《浙江社会科学》2019 第 12 期。

[27].王天宇、彭晓博：《社会保障对生育意愿的影响：来自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证据》，《经济研究》2015 第 2 期。

[28].汤兆云、郭真真：《经济水平对生育意愿的影响分析——一项经验研究：基于 621 份调查问卷的数据》，《人口与发展》2012 年第 3 期。

[29].王志章、刘天元：《生育“二孩”基本成本测算及社会分摊机制研究》，《人口学刊》2017 第 4 期。

[30].何兴邦、王学义、周葵：《养儿防老观念和农村青年生育意愿——基于 CGSS(2013）的经验证据》，《西北人口》2017 年第 2 期。

[31].周俊山、尹银、潘琴：《妇女地位、生育文化和生育意愿——以拉萨市为例》，《人口与经济》2009 年第 3 期。

[32].段文婷、江光荣：《计划行为理论述评》，《心理科学进展》2008 年第 2 期。

[33].王俊祥：《孩子的价值及对孩子数量、素质和性别的选择》，《中国人口科学》1990 年第 2 期。

[34].周林刚、冯建华：《社会支持理论一一个文献的回顾》，《广西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学版）》2003 第 3 期。

[35].施建锋、马剑虹:《社会支持研究有关问题探讨》,《人类工效学》2003 年第 1 期。

[36].吴明隆:《结构方程模型-AMOS 的操作与应用》, 重庆大学出版社 2009 年版。

[37].邱皓政、林碧芳:《结构方程模型的原理与应用》, 中国轻工业出版社 2009 年版。

[38].Ajzen I (1991).“The Theory of Planned Behavior.”Organizational Behavior and Human Decision Processes (2):179-211.

[39].Kopelman R,Greenhaus J,Connolly T (1983). “AModel of Work,Family and Interrole Conflict:A Construct Validation Study. ”Organizational Behavior and Human Performance(38):198-215.

[40].Higgins C A,Duxbury L E (1991). “Gender Difference in Work Family Conflict. ”Journal of Applied Psychology (1):60-72.

注释:

1 因中国国家统计局还未公布 2020 年中国出生人口总数,这里使用中国公安部户政管理研究中心发布的 2020 年出生并已经到公安机关进行户籍登记的人口数据作为比较。

2 有关中国人口总和生育率数据, 作者参考的是《中国生育报告 2020(恒大研究院发布)》, 该《报告》注释说明恒大研究院所用的数据来自中国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

3 为节省篇幅, 图三中所有变量之间的标准化载荷取值没有单独列表, 如因看不清楚确实需要的, 可以联系作者索取。